

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

李瑞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周秦时期的图书生产和流通	1
第一节 图书生产的萌芽	1
一、汉字的起源和使用	1
二、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演进	3
三、文字使用者——史官的出现	8
四、记录材料的积累	12
五、最早的书籍编纂	13
第二节 书籍成为社会读物的开端	22
一、读者群和作者群的崛起	22
二、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商品交换的发展	26
三、孔子在编纂事业方面的业绩	27
四、战国时期的书籍编纂	35
五、秦代的图书编纂	40
第三节 早期图书的传播和流通	44
一、官府藏书及其阅读范围	44
二、早期图书的传播方式	46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流通	50
四、私人藏书的出现	54
五、图书的毁损和散佚	55
第四节 图书流通的作用和影响	59

一、引起了人们对图书的重视	59
二、促进了士阶层的兴起	62
三、促进了百家争鸣	62
四、促进了书籍体制的完善	63
第二章 两汉时期图书的生产和流通	67
第一节 图书生产的扩展	67
一、编纂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67
二、图书形制的演进	76
第二节 图书传播和流通的方式	80
一、口耳相传	81
二、师徒授受	82
三、搜求、集聚和散佚	87
四、赐赠	92
五、传写复制	93
六、书肆买卖	95
七、对外交流	97
第三节 图书流通的新标志:藏书体制的奠定	99
一、官府典藏制度的建立	99
二、流通范围的扩大和私人藏书的风气	101
第四节 图书流通的积极影响	106
一、扩大了认识领域	106
二、促进了图书整理事业	109
三、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促进了学术繁荣	113
四、对完善书籍体制和更新书写材料的影响	117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图书流通	120
第一节 图书形制的转折——向纸写本过渡	120
一、纸的广泛使用	120

二、图书形制的重大变革·····	122
第二节 图书编纂领域扩展,流通品种增加·····	125
一、编纂领域的开拓·····	125
二、图书结构的变化和流通品种的增长·····	131
第三节 图书流通的方式和范围·····	133
一、图书流通方式的发展·····	133
二、图书流通范围的扩大·····	144
三、对外流通的萌芽·····	150
第四节 图书流通中的聚散现象·····	153
一、藏书管理机构的演变·····	154
二、图书聚散的频繁·····	156
第五节 图书流通的作用和影响·····	161
一、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勃兴·····	161
二、促进了古典目录学的发展·····	163
三、促进了人们对图书认识的提高·····	170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图书流通·····	173
第一节 图书制作的变革·····	173
一、纸的普及·····	173
二、雕版印刷的发明和使用·····	175
三、装帧形式的演变·····	179
四、图书生产主体的变化·····	180
五、版本的发源·····	184
第二节 著述的繁盛和图书来源的扩大·····	187
一、重视文教和儒学的复兴·····	187
二、修史制度的建立和史学的兴盛·····	192
三、文学艺术的繁荣·····	197
四、医药科技著述的繁盛·····	199

五、佛经的汉译·····	202
第三节 流通方式的发展和范围的扩大·····	204
一、官学渠道的扩展·····	205
二、商业渠道的开辟·····	207
三、私学渠道的扩大·····	208
四、寺院渠道的形成·····	212
五、周边地区的图书流通·····	215
六、图书的对外流通·····	221
第四节 图书流通中的聚散现象·····	232
一、图书管理机构的变迁·····	232
二、国家图书的集聚和散失·····	234
三、民间藏书的演变·····	236
第五节 图书流通的文化效应·····	239
一、认识上达到的新水平·····	239
二、国家藏书的整理编目·····	241
三、国家藏书的管理和使用·····	244
四、佛教经典的整理·····	245
五、图书流通促进了类书的编纂·····	246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图书流通·····	248
第一节 图书生产的重大变革·····	248
一、雕版印刷的繁荣·····	248
二、刻书业的特点·····	260
三、活字印刷的发明·····	267
四、宋元写本·····	269
第二节 图书来源的开拓·····	272
一、大型图书的编纂·····	272
二、传统学科的发展·····	274

三、宗教书籍的编纂·····	280
四、汉文外译的开拓·····	284
第三节 图书流通的重大突破·····	288
一、印本书流通量的急剧增长·····	288
二、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的拓展·····	290
三、流通范围的扩大·····	296
第四节 图书流通的社会效果·····	310
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310
二、促进了藏书体系的形成和藏书理论的发展·····	316
三、促进了文献学的发展·····	324
四、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管理·····	329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图书流通·····	335
第一节 图书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335
一、编纂事业的高度繁荣·····	336
二、图书的刊印和制作·····	355
第二节 图书流通的方式和规模·····	368
一、图书经营的发达和图书市场的扩大·····	368
二、字版买卖和流动排印·····	371
三、图书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流通渠道的拓展·····	372
四、传抄和借抄:传统流通方式的延续·····	380
五、图书的对外流通·····	381
第三节 朝廷的干预和图书的聚散·····	398
一、朝廷对图书流通的干预·····	398
二、官府藏书的盛衰·····	405
三、私家藏书的兴盛·····	409
四、藏书体系的多元化·····	412
第四节 图书流通的社会影响和文化效应·····	416

一、藏书观念的改变和流通概念的萌芽·····	416
二、促进了版本目录学的繁盛·····	420
三、促进了国内不同语种的互译·····	424
四、促进了汉文化在国外的影响·····	426
结束语·····	435
后记·····	438

前 言

图书在本质上属于精神产品,其主要功用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但这种观念的东西必须以物质形式为载体,具备物质外壳。这就是说,作为观念的产物,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但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它又是一种物质产品。因此,图书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产物。精神生产是图书内容的创造,物质生产是知识载体的制作。两者如何结合,决定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作用和价值。

图书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图书又具有商品属性,是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特殊商品。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图书也是带着这两种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图书的生产状况决定图书流通的方向、方式、规模和范围。但另一方面,图书生产的特殊性也决定图书流通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说,图书的生产和流通集中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体现民族智慧的积累,因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图书的流通首先是精神产品的传递交流,同时又以商品形式参与全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图书生产的二重性构成图书流通的特性。

基于上述观点,本书试图把中国图书流通史放在中国文化史的总体中来考察,把它看作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性成为本书叙事立论的重心。本书所说的图书流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指图书市场上的商品性交易,也包括图书以各

种方式进行的非商业性的传递交流。

图书起源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也是图书生产的前提。我国汉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迄今已有 6000 年左右。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就是一种物证。经过二三千年的演进,到殷商时期已出现了甲骨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共有字 4600 个左右,这说明距今 3500 年以前,汉字已渐趋成熟。汉字的成熟期,也是汉文图书的萌芽期。《尚书·多士》篇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关于书册的最早记载。《汉书·艺文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记言记事,整理成册,就是书籍的滥觞。继甲骨文之后,又出现了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如果说史官记录整理的书册属于王室档案,不是面向社会,那么,金石刻辞就具有新的意义,不是为了保存在金匱石室内供王者备览,而是面向社会的开端。正如清阮元所说:“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①铸金刻石在空间上有传播之便,在时间上有流传之功,具有图书所必备的社会性。但这毕竟还属于萌芽状态,不是正式的书册。秦汉以后,人们开始广泛地使用竹片和木板,作为书写材料,写完扎成简牍,这就是我国正式书籍的最早形式。甲骨文和铭文里都有“册”字,和上引《尚书》的“有册有典”,都说明,至迟在公元前 1300 多年以前,我国就有了简册。在简牍时期,人们还用比较昂贵的缣帛来书写,跟竹简并称为“竹帛”。与金石比较,竹帛更便于刻写和传播,因而在东汉以前,竹帛一直是主要的书籍制作形式。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竹简 4942 枚,都是先秦古籍和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 年)的历谱等,包括一部《孙子兵法》,一部失传多年的《孙臆兵法》。1972—1974 年在湖南长沙马

^① 阮元:《擘经室三集·文言说》。

王堆西汉初期墓中发现帛书 28 种。其中《战国策》1.2 万字,大半内容为今本所无,《周易》也比今本多出 4000 余字。还有整部的佚书和地图。这批帛书的内容涉及战国至汉初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说明竹帛作为一种文化知识的传播工具,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也是书籍制作的一大变革。汉代开始用纸做书写材料,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因此,汉唐时期是我国图书生产和流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这以前,无论是竹简、木牍或缣帛,都只能用手工书写,产量和流通范围都受到很大限制。纸品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图书可以批量生产,大量流通。如果说,文字是语言飞翔的翅膀,书籍是文字飞翔的翅膀,那么,印刷术就是书籍的分身术,一种书籍可以在同一时间多方向多途径地向社会传播。这种制作方式使图书流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宋代以后书坊书肆的大量增加和图书贸易的急剧增长,就是这个转折的反映。

但是,长期延续的封建制度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封建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固定板滞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城市手工业基本上是为官府服务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加上山河阻隔,交通闭塞,这一切,不能不对图书流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扩大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在某些地区、某些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形成了新的市民阶层。这种历史趋势无疑给图书的生产带来新的刺激和活力,促使图书流通向多元化、多渠道的方向发展。到清代,封建社会的图书流通已达到了发展的顶点,进入了饱和状态。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清代的图书编纂事业也进入总结阶段,封闭型的藏书体制也逐渐开始松动。这一切意味着,长期制约着图书流通体制的封建制度已走到尽头。到清末,中国文化史,

包括图书流通史,已进入大转折的前夜。西方列强的侵入,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是促使旧制度走向解体的外来因素。

上述文化史的角度和图书流通二重性的观点,是形成本书框架结构的理论依据。把图书流通放在商品运动之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并把各时期图书流通的文化效应纳入论述范围,为全书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关章节安排力图反映我国图书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轨迹,显示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中国图书流通史的编纂领域,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只能从零开始,无可依傍。历史资料十分分散,钩稽不易。本书取材以先秦典籍和历代正史为主,同时尽量利用历代野史笔记的零星记载。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材料,本书从图书流通史角度,力图发掘其新的历史信息。有些材料偶尔重复使用,但角度不同,含意有别。有些具体情况不见记载,无法取证,只好从略。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尝试。疏漏错讹之处,有待专家和读者指教。

1997年3月

于白楼小寓,

时年七十五

第一章 周秦时期的图书生产和流通

第一节 图书生产的萌芽

我国图书是在以下诸条件的创造过程中产生的：一是汉字的发明和使用；二是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演进；三是文字使用者——史官的出现；四是记录材料的积累。以上各种条件，都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图书是在这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产生的。

一、汉字的起源和使用

汉字源远流长，很早就有关于汉字发明和使用的记载。《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后世圣人，谓黄帝尧舜也。”这两段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字发明之前，有一个结绳记事阶段，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二是文字发明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即所谓“百官以治”。

现有资料说明，《易·系辞》所载的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先是结绳记事，后来才有文字，这是世界许多民族共有的经历。说文字发明于黄帝尧舜时，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关于文字起源于黄帝时的传说，由来已久。《世本·作篇》：“黄帝使仓颉作书。”后来《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以至汉代的《淮南子·本经训》、《说文序》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考古资料说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些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被认

为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迄今已有 6000 年左右。从汉字的起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集体创造过程。仓颉所做的应是继承和整理,起了整齐划一的作用,可以说是促使文字定型的关键人物。近人章太炎《造字缘起说》:“《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字者。”夏朝建立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在设官分职时,有专人研究并使用文字,促进了汉字的成熟。汉字也因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并蒙上了神秘色彩。《淮南子·本经训》说:“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就是神秘化的反映。到夏商之际,汉字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尚书》有《夏典》,夏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说明人们已能运用汉字记录政事活动。这些历史资料,单靠口传是不能那样完整地流传下来的。现存最古的文字是 3500 年前即商代后期的殷墟甲骨刻辞。从 1899 年清国子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在安阳地区的大规模发掘,至今已先后获得甲骨十余万片。文字多少不等,少的三五字,多则几十字。经研究,这些甲骨文是盘庚迁殷(公元前 14 世纪)至殷亡(前 12 世纪)前后 270 多年的文字记录。1977 年又在陕西周原地区发掘出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 17000 多片,其中刻有文字的有近 200 片,一片多者有 30 字,共 600 多字。字形很小,刻画整齐,说明雕刻技巧已相当熟练。从形体看,尽管字形与现代汉字很不相同,但甲骨文已具备多种形式;从文字结构看,有形声字、通假字、数序字和用作人名和族名的符识字,说明甲骨文已进入成熟阶段。从内容看,大量的的是占卜刻辞。殷民族迷信鬼神,遇到国家征战、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大事,统治者都要占卜问神,以定吉凶,然后把占卜结果刻在甲骨上。除卜辞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记事刻辞,与卜辞无关。如记载战争、战俘数字、田猎收获多少、封赏和祭祀情况等。单独的记事刻辞多刻在兽骨上。这些都是当时史官的政事记录,

流传下来,就是历史文献。王国维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顾颉刚撰有《周易卦文辞中的故事》,就是利用甲骨卜辞考证殷代王室世系、称呼名号和殷周政治文化制度的,可见殷代汉字已能够为后人提供考证资料。但另一方面,甲骨刻辞行文过于简略,记事还不完备。从用途上说,甲骨刻辞只是王室的库藏,供事后稽查参考,不是为了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也不在社会上流通。所以严格来说,甲骨文毕竟还不是书籍。

二、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演进

文字必须用一定的工具书写在一定的物质材料上。早期的文字称为书契。《易·系辞》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其木,谓之书契。”篆文:“书”像人手执笔,“契”指人工刻出的符号,书契即用笔和刀刻写的早期文字。就所用材料说,文字发明之前经历了结绳和刻木记事阶段。刻画符号和图画符号则出现在器物上。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面已有接近文字的图画。但这还不是正式的文字。文字产生以后,书写材料多种多样,反映了人们的探索过程。就其用途来说,早期的书写材料可分两类:一类供刻辞用,另一类则向书籍载体演进。

供刻辞用的书写材料有龟甲、兽骨、玉、石和金属器物,制作刻辞的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属刀具。甲骨文字已见上述,这里着重谈金属器物。

商周时除利用甲骨外,还在青铜器物上刻铸文字。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青铜器的发明使用使人类由新石器时期进入青铜器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商周青铜器种类很多,有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物,形制复杂,工艺精美。这些器物都是王室贵族的专用器,祭祀时摆设的青铜器物反映贵族内部的等级。

特别是礼器中的大鼎，是“国之重器”，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极为珍重。战国时齐宣王伐燕，“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认为这样做太过分，应当“止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作为保存其国家的象征。可见到战国时大鼎还被视为国宝。贵族统治者往往把需要记载下来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法典刻铸在青铜器底或器壁上，传之久远。后来称之为铭文，也叫金文或钟鼎文。商代青铜器铭文较短，一般只有两三字，字数较多的“小臣觶卣”也只有 53 字。周代青铜器铭文字体整齐，字数增多，一般有一二百字。西周的大盂鼎有 291 字，毛公鼎铭文长达 497 字，金文分五段，记录周成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册命，以及对毛公的告诫，内容与《尚书·周书·文侯之命》相近，已具有典籍的雏形。铭文的内容大多是记载重要的祭祀活动、征伐、封赏、册命、券书、誓约、训诰和颂扬祖先功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先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春秋时有刑鼎。《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杜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在刑鼎上记载法律条文，具有晓谕全国、昭示后代的意义。自商代至汉代，都盛行在金属器物上刻铸文字，而以西周最为盛行。据孙稚维《金文著录简目》统计，现已发现有铭文的古代青铜器物共 7312 件，包含单字约 3500 个，目前已能辨认的约有 2000 个。这些铭文直接记录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流传下来，就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青铜器物不是为了刻铸文字，铭文只是青铜器的附属，不具备书籍的形制和特性，只能说是文字记载的萌芽。

除金属器物外，另一种书写材料是玉石。在玉片或石块上刻写文字，由来已久。刻石记事，也萌芽于夏代，春秋战国时已颇为普遍。《墨子》就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的说法。传世的石刻文字以唐初陕西出土的十个石鼓上的刻文为最早，被称为石鼓文。每个石鼓各刻四言诗一篇，共有单字 700 个以上，字体近于籀文，

为东周时秦国石刻,字迹漫漶,已难辨认,原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稍后有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三篇祷文,内容是诅咒楚怀王熊槐。原石亡于南宋,有《巫咸》、《厥湫》二拓本传世,字体与石鼓文相似。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上出土玉片和石片600多件,上尖下方,长短不一,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面有很多用毛笔书写于玉石片上的字,呈朱色或墨色。因内容都是盟誓文字,被称为“侯马盟书”。经考证,这是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为了取得同族人的支持而主持订立的盟誓活动记录。篇幅长短不一,多的200多字,少的十余字。这些盟书虽不是正式的书籍。但内容丰富,为后人研究古代社会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四次出巡,先后在峰山、泰山、琅邪山、芝罘、碣石和会稽等六处刻石纪念。这些刻石,除峰山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均有记载。现存实物仅有琅邪山和泰山刻石残块。刻辞每句四字,韵文,开头是对秦始皇的颂辞,后附秦二世诏。字体为小篆,相传系丞相李斯所书。

以上都是书籍产生以前的文字载体。甲骨文和青铜器都不是书籍的刻写材料,碑石不能像普通书籍那样流传,刻辞和铭文也都不是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所以,都不是书籍。不过,这些刻写材料反映了书籍载体的演进过程,为书籍的产生做了准备。

正式书籍的书写材料是从简牍开始的。简牍制度代表了我国书籍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简是竹片制成的简册,牍是木板制成的版牍,以竹、木为书写材料,合称简牍。单片的竹片称“简”,将若干片编连起来,称为“册”。“册”也称“策”。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字。简册的制作方法,据刘向《别录》:“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文选》李善注引,又东汉应劭《风俗通》亦有类似引

文)。王充《论衡·量知篇》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契，枿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简策长短不一，一般以长简书写国家法令和经典，以示尊重，长度为三尺，古史有“三尺法”的说法。木版称“牍”，长度与简相同，而宽为简的五倍，能写五行以上的文字。一尺见方的木牍称“方”，汉以后用于书写私人函柬，称为“尺牍”。版牍是简策的辅助材料，大多用于书写短文。

我国殷商时已使用简牍，是可以肯定的。甲骨文已有“册”字和“典”字，“册”像简牍编连之形，“典”像把册放在几案上。甲骨文称史官为“作册”，表明史官的职掌。关于册典，古籍中屡有记载。《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尚书·多士》载周公对殷遗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典，大册也。”这都说明商代已有简册。

周代用简策的记载更多。《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左传·隐公十一年》：“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左传·襄公二十年》：“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至于版牍，周代也已使用。《周礼·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商周时的简牍，至今没有实物发现，这与年代久远，简牍朽坏有关。早在魏晋时期，已有竹简出土。据《晋书·束皙传》载，晋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战国魏襄王墓，出土了几十车竹简，武帝命令整理，得《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16种古籍，都是秦汉以来没有传本的。近代以降，陆续发现一些简牍，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属战国前期，最晚的是新疆吐鲁番晋墓所出晋简。

简牍的使用，从商周起，直到魏晋时，因纸的普遍使用而逐渐淘汰。

后于简牍的另一种书写材料是缣帛，用缣帛书写的书籍称为